

绥中三道岗沉船研究新成果 元代时环渤海航线很繁忙

本报记者 商越

核心提示 近日,葫芦岛市博物馆在抖音上直播《绥中三道岗沉船探秘》,吸引了众多粉丝围观。被网民热议的还有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孙健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环渤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葫芦岛海域是环渤海地区古代航线的重要线路,而绥中县的止锚湾、石河口等地在元代是颇为繁忙的港湾。

商船遭遇搁浅 整体倒扣沉底

三道岗沉船地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属渤海海域。近日,葫芦岛市博物馆在抖音上直播《绥中三道岗沉船探秘》,吸引了众多粉丝围观。三道岗元代沉船的打捞再次引起热议。

1991年7月,绥中县渔民在三道岗海域打捞出一批古代瓷器。10月,国家文物局委派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的专业考古人员赴绥中展开调查,共采集遗物39件,其中有一件疑为船板的木质标本。经测定,为距今740年±80年,与瓷器的时代特征高度吻合,因此,确认这是一处元代沉船遗址。

由此开始直至199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联合全国各地水下考古人员组成了“绥中水下考古队”,对三道岗元代沉船遗址进行多次勘探发掘,工作中大量使用了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侧扫声呐、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当时的先进科技手段,发掘出水文物共2000余件。这一项目是我国首次独立自主开展的水下考古发掘,被称为“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捞”,入选“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曾参与这次水下考古行动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孙健回忆,沉船的深度约13米至15米,由于在海底浸泡了约700年,发现时船体已经解体破裂,形成了数块巨大的凝结核。文物散落在沉船凝结核周围,包括罐、盆、碟、碗、瓶等瓷器及大量成摞的铁锅、铁型铲等铁制生活用品。当时有大量的海洋生物寄生于沉船及瓷器、铁器等物品上,绝大部分瓷器出水时被海蛎覆盖。从大型凝结核堆积情况判断,这可能是一艘船底形态比较平缓的七舱或九舱沙船,长度约21米,宽约9米,高约3.3米。

元明时期,在中国北方沿海航行的海船主要为沙船。明代军事家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载:“沙船能调战,使斗风,然惟便于北洋而不适于南洋,北洋浅南洋深也。沙船底平,不能破深之大浪也。”因此考古人员推测,沉船有可能是内河、近海兼用的方头、方尾、平底河海两用船。据沉船现存体积判断,沉船排水量在100吨左右。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三道岗沉船沉没的呢?孙健分析,古代海上航行船只的遇难,多是遭遇恶劣天气、触礁搁浅以及人为操作失误等因素导致。沉船遗址距大陆约5.5千米的海域,因有三道大的沙岗,当地俗称三道岗。三道沙脊只有在退大潮时才露出水面,沙脊顶部最浅处仅2米,沙脊之间最深深处达18米,底部为沙质淤泥,水底地质复杂。而沉船的位置,就在三道沙岗中两个沙脊之间的沟底。

此外,沉船遗物分布比较集中,文物分散范围较小,可以看出当时沉船应是在海面上较为平直的情况下下沉的。从船体横向剖面看,呈上窄下宽倒覆形状。因此可推测出,元代沉船可能是遭遇三道岗沙脊搁浅,导致原地沉入海底,并在沉没的过程中,船体发生了翻转。还原当时的场景可能是:遭遇狂风巨浪夹击,船只误入三道岗海域搁浅,船员来不及自救抛出重物,船就很快破进水沉没,倒扣在水中,船上的瓷器被保留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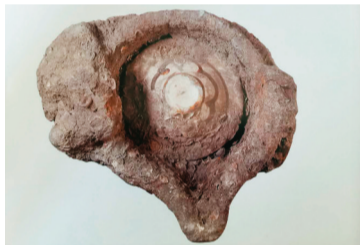
三道岗沉船水下考古工作现场。



鱼藻盆。



黑白釉小碗。



出水瓷器覆盖凝结核。



三道岗元代沉船整理出的瓷器。

磁州窑瓷器跨海而来

考察三道岗沉船中的遗物,考古人员发现,都是重量大、不易陆运的瓷器、铁器。从出水瓷器的器型、釉色及装饰特征来看,三道岗沉船瓷器应是磁州窑的影纹窑产品。

葫芦岛市博物馆馆长孙建军告诉记者,磁州窑窑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彭城镇和磁县观台镇一带,磁县宋代时叫磁州,磁州窑由此得名。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北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的生产进入最盛期,产量增大,种类繁多,各种装饰技法精湛且别具特色,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窑场,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主要生产满足百姓需求的民间日用瓷器。

磁州窑的瓷土并不理想,因含少量杂质,白度不高,故胎呈灰白色或灰褐色,但民间工匠

挥聪明才智,在器物表层涂上薄薄一层白色化妆土,再施釉,创造了水墨画风的白地黑绘装饰艺术,黑白对比强烈。磁州窑装饰颜料使用的是当地出产的一种含铁颜料,烧成后的瓷器花纹也被称为铁彩。绘制花纹的方法有绘画、印花、剔花等,花纹图案复杂,构图流畅洒脱。元朝人的性格粗犷豪放,因此元代磁州窑也具有这种淳朴敦厚、粗犷雄健之风。

孙建军介绍,三道岗沉船瓷器中较为精美的有白釉铁彩龙凤纹罐、白釉铁彩云雁纹罐、白釉褐彩婴戏纹罐、鱼藻盆、黑釉兔毫瓷碗、白釉梅瓶和橄榄形双系陶瓶等,均收藏于葫芦岛市博物馆。1959年,大连的对面沟村元墓出土两件磁州窑白釉褐彩大碗与白釉小碗,无

论是胎质还是釉色图案,均与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所出的磁州窑瓷器极为近似,证明元代确有磁州窑产品运至辽东一带。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在河北、浙江、江西等地,以及日本、朝鲜半岛,都有同一时期类似的磁州窑产品,这也反映出元代磁州窑行销范围和影响非常广泛。

磁州不仅以生产瓷器著称,宋元时期更是以冶铁业闻名,且盛产煤炭。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载:“磁州固镇冶务旧置”,说明宋代以前,磁州的固镇已经置铁冶,至今邯郸仍是我国的钢铁基地,磁县境内仍有矿区。因磁州彭城窑地处滏阳河上游,因此三道岗元代沉船很可能是从产地直接将特产瓷器和铁器装船启运。

发达的海运从运送漕粮开始

这艘满载着瓷器和铁器的元代商船,是从哪里,又要到哪里去呢?孙建军告诉记者,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这艘元代商船应是从滏阳河上游的磁州彭城镇出发,先经河运到达直沽(今天津市),然后进入渤海,沿渤海湾北岸航行,目的地很可能就是渤海沿岸地区。

中国古代的航海活动及航海贸易主要有两条路线,其一是由今广西、广东、福建及浙江一带的港口出发,面向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其二是由渤海湾及东部沿海港口出发,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葫芦岛海域是环渤海地区古代航线的重要一环。

元代海运发达还要从运送漕粮说起。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要从江浙一带运送粮食到大都,于是命人将隋代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裁弯取直,

使京杭南北大运河直通。但运河漕运常因天旱水浅、河道淤塞不通,致使漕船不能如期到达。于是朝廷开辟海漕运粮,很快成为南北粮调的重要途径。因距大都仅百余公里,直沽港成为枢纽,这里既可通过大运河等水系通达黄河、长江流域,又可顺海河而下进入渤海湾,或南下江南,或东进辽东、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因此号称“军粮城”。

元代诗人张翥在《蜕庵集》中说:“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甬越布满街衢。”反映出海陆交通给直沽乃至北方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元史》记载,为加强对直沽港口的管理,朝廷还相继设立了漕粮接运厅、都漕运司、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等管理机构。元代定都北京,畅通了南北运输,也拉动了环渤海地区所在的北方经济,孕育出众多港口城

市,环渤海海上民间商贸随之活跃。孙健告诉记者,《明史》中多处记载,环渤海地区的止锚湾(绥中县万家镇境内)、石河口(绥中县辖区)、洋河口(秦皇岛市辖区)、戴河口(秦皇岛市北戴河附近)等地在元代便是繁荣的港湾,成为海上运输的重要中转站。

由于蒙古族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影响较少,故元朝很重视商业贸易,还颁布了有利于贸易发展的政策。如《元史》记载,元至大三年(1310年)“禁权要商贩挟官、鬻官、令官,阻碍会通河民船者”,为鼓励民间运输,还允许粮船夹带一些南方商品。河海运输的兴盛,也急速提升了元代的造船能力和罗盘导航技术,为100多年后明朝郑和下西洋,作了重要铺垫。

(本文图片由葫芦岛市博物馆提供)

三座石坊 见证明亡清兴

本报记者 朱志鹤 文并撰

李成梁与努尔哈赤

江西有3座明朝石坊,一座在北镇,另两座在兴城。

李成梁石坊横跨北镇商业步行街。石坊华美精致,雕工细腻,仿木构牌坊样式雕造,为四柱、五楼庑顶式,通体呈淡紫色。石坊通高9.25米,宽10.5米。在石坊的坊额部分,竖刻“世爵”二字;在横额部分,刻有“天朝浩券”四个大字,以及“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守远伯李成梁”。石坊建造于明“万历八年十月”(1580年),距今已逾400年。

1580年时李成梁战功显赫,声望正隆。此前几年,他多次击退侵扰边境的蒙古各部,遏制了女真崛起。正因此如一根定海神针,保卫了大明王朝东北边境的安全,所以,他被万历皇帝封为“守远伯”。

时至今日,后世一直盛赞抗倭名将戚继光,其实据史料记载,当年镇守辽东边境的李成梁,其威名不在戚继光之下。万历年间,这两位名将一南一北守护边境,确保大明江山的一时安稳。

名将的身后有着“明相”做支持,他就是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张居正。

1572年,万历皇帝正式登基,此时距离明朝开国已过200年。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深谋远虑的张居正已经看到了这个王朝潜藏或已暴露的积弊,于是在1573年,他启动了“万历新政”,这也被后人称为“张居正改革”,其中就包括军事改革。而起用并重用包括戚继光、李成梁等在内的一大批名将守边疆,是张居正具体改革举措之一。

虽然铁岭人李成梁以90岁高龄寿终正寝,但,这位长寿老人在自己的仕途上起伏跌宕,屡经坎坷。

大器晚成的李成梁40岁才算踏入仕途,之后,因屡建战功,尤其是多次击退蒙古军队对明朝边境的侵扰,他才平步青云,一步步官至辽东总兵。皇帝敕建的石坊让李成梁走上了

仕途巅峰。但11年后,即1591年,李成梁因“贵极而骄,奢侈无度”被弹劾罢官。

学者分析,李成梁因此理由被罢官并不冤屈。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带兵更为“人治”化,也就是更多依靠他本人的个人魅力,这种情况下,用丰厚的赏赐来激励士气就成为李成梁惯用的手段。如此管理方式,既容易形成官兵对他的个人崇拜,以及众人对物质的过分看重,也容易出现李成梁自身的“奢侈无度”。

从1591年罢官到复职辽东总兵,李成梁赋闲了整整10年。1601年,重新被起用的李成梁已经76岁高龄,这位此前镇守辽东22年的老人又回到了他曾经熟悉的土地。不过7年后的1608年,李成梁再一次遭到弹劾。与上一次不同,这一次的弹劾风波“有惊无险”,李成梁继续稳坐总兵职位。又7年后,这位前后镇守辽东边境近30年的老人溘然离世。

李成梁应该不会想到,自己用大半生构筑的东北边境安全,竟然会在自己去世后的第三年即被撕裂一个大口子,而这动手撕裂明朝版图的,恰恰是自己的故人努尔哈赤。

李成梁年长努尔哈赤33岁,努尔哈赤16岁那年,他曾在李成梁的帐下生活过一段时间。正因如此,对于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二人之间的关系,后世众说纷纭,指责李成梁为“汉奸”者有之,怒斥李成梁是“养寇”者也有之。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陈澧分析认为,李成梁驻守辽东边境的职责,既包括打击蒙古部落的侵扰,也包括控驭女真部落。正因为如此,李成梁一定会与努尔哈赤关系密切。在控驭女真部落的过程中,李成梁对女真族实行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严厉打击不顺从者,而对“忠顺”的努尔哈赤则比较宽容,这在客观上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扫清了障碍,但“不能说李成梁是有意扶持一个他所服务的王朝的叛逆者、掘墓人。”陈澧说。



李成梁石坊。

袁崇焕与祖氏兄弟

就空间而论,位于兴城的祖氏石坊在北镇李成梁石坊西南180多公里外;若就时间而论,前者比后者晚建50余年。

穿过兴城古城南门“延辉门”,步行百余米即见祖大寿石坊,北侧几十米处,则是祖大寿的堂弟祖大乐石坊。这两处石坊统称为“祖氏石坊”。

明崇祯四年(1631年),崇祯皇帝下令为祖大寿建造石坊;七年,这位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再次下令为祖大乐同样建造一座石坊,希冀祖氏兄弟能够世代效忠朝廷。

虽然距离只有几十米,但这两座石坊在造型、石材选择等方面均有不同。祖大寿石坊高11.5米,宽15米,采用白色花岗岩建造,石坊上层正刻有“忠贞胆智”四个大字。祖大乐石坊则采用褐色岩石建造,高16.6米,宽13米,在额坊正刻有“登坛烈骏”四个字。

尽管已隔300多年,但站在两座雕工细腻、造型精美的石坊中间,作为一名旁观者都能强烈感受到当年的祖氏是何等荣耀与辉煌,更遑论作为当地望族的后裔。而这正是崇祯皇帝想要达到的效果。

从哥哥手中接过皇权的崇祯皇帝同时也接过了一个烂摊子,此时的大明朝战事四起,朝纲混乱,岌岌可危。就在下令建造祖大寿石坊的前一年,也是八旗军进攻京师的紧要关头,副都督袁崇焕被崇祯“千刀万剐”。作为袁崇焕副将的祖大寿及部下目睹了这一切,军队随时都有哗变的可能,为了安抚人心,崇祯帝下令相继修建了祖氏石坊。

就在祖大寿开始筑造大凌河城,以护卫锦州城。但工程还未完工,即被八旗兵围困。在被困3个多月后,祖大寿献城投降。让人想不到的是,祖大寿从敌军阵营中脱身后,来到锦州城继续抗击八旗军,直至1641年他第二次正式降清。对祖大寿第一次投降八旗军,是真降还是诈降,史学界至今仍有争议。

在明朝衰败与清朝崛起的大势之下,原本为表彰功绩、笼络人心的石坊无意中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道具——李成梁石坊的主人不知不觉间孕育了颠覆大明政权的力量;祖大寿石坊的主人则直接调转方向,将炮口对准了曾经的故土。趋势如滚滚洪流,让一切皆有可能。

(采访支持:锦州历史学会副会长、北镇市文广局副局长贾辉;兴城历史文化博物馆顾问、兴城市历史文化学会理事周连生)



更多精彩内容 扫码观看



白釉梅瓶。



白釉铁彩龙凤纹罐。